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

试论乾隆

张羽新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试 论 乾 隆

清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代皇帝。1711年（康熙五十年）生，1723年（雍正十三年）八月继承皇位。操国柄达六十年之久，直到1795年（嘉庆元年）才把皇位传给儿子嘉庆，自己当起了太上皇。1799年（嘉庆四年）死去。

乾隆执政的这段时间，是清朝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清王朝巩固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国内出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稳定的局面，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封建的经济、文化也曾经一度出现光复照似的繁荣，过去的一些历史学家曾经称为“康乾盛世”。

但是，另一方面，清朝的统治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腐化，吏治败坏，表面繁荣的清朝帝国已经，患了不治之症。

任何人当然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是，乾隆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在封建专制的制度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活动，会对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研究乾隆，对于了解清王朝的由盛变衰的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乾隆自诩为。他自诩为历史上“罕有伦比”^①的帝王。一些国内外的清史研究者，也曾经对乾隆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评价。正象对其他历史人物常常有的情形那样，对乾隆也是毁誉纷纭的。

随着国内外对清史研究的日益重视，乾隆这个历史人物，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也需要我们对于这个历史人物展开深入讨论，以便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对其作出恰当地评价。这不仅对于推动清史的研究而且对于现实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只就乾隆的某些方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抵御外来侵略，统一新疆、保卫西藏
地方的安全，乾隆平叛之后，完成统一
祖国的事业。

乾隆执政时期，继康熙、雍正之后，多次对西北用兵，于1755年（乾隆二十年）平定了达瓦齐叛乱，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叛乱，结束了康熙以来将近一个世纪的对准噶尔部的作战，彻底粉碎了准噶尔部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的分裂叛乱活动。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肃清了新疆南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清朝完全统一新疆，这是清朝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标志着清朝统一全国事业的彻底完成。同时，它在乾隆的全部政治活动中，也占着突出的地位。乾隆在执政的晚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总结自己的一生的活动就说过“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③。他当太上皇之后，看法略有转变，认为南巡不足取，但始终认为统一新疆是他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中外涉及到乾隆评价的著作、文章，毫无例外地都突出提到了这个问题，苏联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否定乾隆也主要是攻击平准^②。我们研究乾隆当然也应该从这个问题开始。

苏联的中国历史研究者说，乾隆平准是“侵略”，是镇压“起义者”者”。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和诬蔑，是一种历史的颠倒。准噶尔部生活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自古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历代中央政权曾在这一带设官治理。准噶尔部是我国厄鲁特蒙古的一支，其首领曾多次受到明朝和清朝政府的封爵。这些都是世人皆知的历史

+ 2 +

事实。乾隆平定准噶尔部，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根本谈不上所谓“侵略”的问题。阿睦尔撒纳等准噶尔部，少数上层反动分子，也根本不是什么“起义”。早在十七世纪初，准噶尔部的上层反动分子噶尔丹，到后来的策妄阿拉布坦、阿睦尔撒纳等人，干的完全是一种分裂活动，他们吞并周围的其他厄鲁特部，使厄鲁特人民长期遭受压迫和战争之苦，而且不断骚扰附近的其他民族。噶尔丹时曾率兵进攻喀尔喀，策妄阿拉布坦时曾骚扰西藏、青海，严重破坏了那里各族人民的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他们还把维吾尔族人民当作“阿拉巴图”（奴仆），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从噶尔丹到阿睦尔撒纳都和沙俄暗中勾结，其目的是要搞一个独立的小王国。他们的这些活动，是一种分裂祖国的叛乱，严重威胁到祖国的安全和统一。乾隆平定准噶尔，完全是一种正义的战争。

平定准噶尔所以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主要是客观上符合了中国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历史趋势，得到了各族人民包括准噶尔部人民的支持。但是，乾隆本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他准确地抓住了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有利战机，果断地下定了决战的决心，促成了战争的迅速结束。

1745年（乾隆十年）噶尔丹策凌死，准噶尔部上层分子为争夺统治权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混战。最后，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夺取了统治权。一些在争夺汗位斗争中失利的上层分子，纷纷投奔清政府。1753年，额尔伯特部台吉策凌等率部三千，次年阿睦尔撒纳等率部二万投奔政府。清政府都给予了隆重接待。这样一来，准噶尔部的分裂势力大大削弱了。乾隆正确、迅速地抓住了这有利时机，他说：“迩来喇嘛达尔扎、达瓦齐等互相争杀，内乱频仍。其台吉车凌（即策凌）、车凌乌巴什、阿睦尔撒纳等款塞内附，先后踵至

……而又当达瓦齐众畔亲离，势同瓦解，此正机有可乘之时。”④

但是，把这个问题交给王公大臣讨论的时候，却是“人心徇于久病，怯畏难之见者多，而具备退之衷者，百无一、二耳”⑤。“举朝有言亥之败（按：雍正九年，清军曾在博克托岭被准噶尔军队打败），不心劳师动众”⑥。只有大学士付恒一人赞成出兵。这种情况并没有动摇乾隆的决心。他采纳了阿睦尔撒纳的建议，决定在第二年春天乘达瓦齐没有准备，青草没有长高，准噶尔部骑兵不能长途奔袭的时候，派两路大军，直捣准噶尔部的心脏地区伊犁。结果于1755年（乾隆二十年）二月出兵，五月即彻底摧毁了达瓦齐的军队。清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达瓦齐本人很快也被俘。

其次，在平准过程中，乾隆坚持与沙俄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取得了平准的彻底胜利。

阿睦尔撒纳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他本来想借助清政府的力量平定达瓦齐之后，自己统治准噶尔各部，但清政府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他便起兵叛乱，旋即被清军打败，逃入俄罗斯。沙、俄早就对我国准噶尔部怀有侵略野心，并多次与阿睦尔撒纳勾结，在清军平准过程中，沙、俄不断进行军事威胁。阿睦尔撒纳的叛逃正好为其所用。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把阿睦尔撒纳引渡回来，是关系到能不能取得平准彻底胜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清朝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乾隆并没有屈服于沙俄的压力，坚决主张追索阿睦尔撒纳。他说：

即如阿睦尔撒纳逃叛之初，朕方手教诸将锐意追擒，而疆臣之议，颇有以伊犁既已平定，不必劳师为言者。及其窜入俄罗斯则更束手相视，付之无可如何。若惟恐朕之绳索过严，以致又启边畔。无论俄罗斯一部，向属和好，彼此不许容留逃人。以理言之，因当向索。而叛贼之奸诡狡诈，既入俄罗斯，岂能郁郁安居，又必将为其所用，以为

+ 4 +

哈萨克一带之患。从前屡降喻旨，所谓叛贼一日不能成擒，则西陲一日不能宁谧。正谓此也。……然俄罗新既已收留叛贼，必且抚而用之。又岂肯永远拘禁耶？索之而不给，则其患在俄罗斯，……堂堂天朝岂有迁就隐忍，苟且自安之理？⑦同时，针对沙俄的军事威胁，严防沙俄的乘机入侵，乾隆一面通过外交途径向沙俄索还阿睦尔撒纳，一面下令加强北部边防，指出：

“现在逆贼阿睦尔撒纳已逃入俄罗斯，俄罗斯与喀与喀毗连，一应侦探、防范事宜，甚关紧要”。⑧

由于采取了防范措施，沙俄未敢乘隙入侵中国边境。同时，由于清政府的正义要求非常坚决，阿睦尔撒纳出痘身死，沙俄不得不将阿睦尔撒纳尸体交清朝派出的官员验看。

乾隆平定准噶尔，在历史上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苏联的中国历史研究者说，乾隆平定准噶尔是对准噶尔的大屠杀，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准噶尔原有60万人，平定以后，准噶尔的人口确实大量减少，但这并不全是清军屠杀造成的。当时准噶尔部天花流行，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死于出痘，另外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逃到了沙俄和哈萨克⑨。清朝是封建统治阶级，从本质上来说是压迫各族人民的，在平定过程中，由于乾隆在政策上的偏差确实也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

乾隆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后，加强了对新疆的行政管理，设置“伊犁将军”总统新疆事务，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混战局面，使新疆各族人民免除了长期的战乱之苦，为新疆地区的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日益加强。有一部分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迁往内地。同时，随着对新疆的开发，也有部分汉族人民进入新疆。乾隆平定以后，向新疆派驻了大量军队，分别

锡伯营、锡伯营、索伦营、库哈尔营、厄鲁特营等。他们携带家属，在新疆定居下来，这就是现在新疆满、锡伯族、达斡尔族的由来。他们共同为新疆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促进了新疆经济、文化的繁荣。

自官兵屯田以来，余地听人占。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羊马成群，皮角毡褥之所出，商贸得珠，甚至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全至。（11）

另外，乾隆平定准噶尔，沉重打击了沙、俄侵略我国西北的阴谋，粉碎了沙、俄企图利用准噶尔上层分子的叛乱肢解我国西北的野心。乾隆平定新疆以后，加强了西北边防，派重兵防守，这不仅保障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沙俄向中亚的扩张，使沙、俄吞并哈萨克草原的速度放慢了。何秋涛说：“俄罗斯所以不敢窥伺哈萨克、布鲁特者，皆慑我伊犁兵威也。盖天山冰岑之间，雄师重镇，实为中国之屏障。”（12）所论颇有见地。在1840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清政府加强了西北边防，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沙俄侵占我国西北的野心，一直没有得逞。

乾隆在打退廓尔喀对西藏的侵略，加强对西藏的行政管理方面，也对中国的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朝取得中央政权之后，曾不断加强对西藏的行政管理，于1653年（顺治十年）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积教普通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赐金册印。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又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赐以册印。达赖和班禅的封号，从此固定下来。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尼泊尔）侵入后藏，被清

军打退。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又一次侵入后藏，并进犯日喀则，大肆劫掠扎什伦布寺，把珍贵的法器 etc 劫掠一空，且侵占了定结、定日、萨噶等地。为了保卫西藏地方的安全，清廷派将军福康安统兵入藏。乾隆说：

目前重务，惟有进剿廓尔喀一事。外间或有议及不应劳师动众以致雨泽愆期者。殊不知廓尔喀系徼外小蕃，前此因与唐古特人（藏族）等盐税细故，侵扰后藏边界，彼时派令巴忠、鄂辉、成德等前往剿断。贼匪即畏惧乞降。此次贼匪复因帐目未清，又来滋扰……竟敢找上扎什伦布，肆行抢劫，若不痛加歼戮，贼匪无所忌惮，必为得尺则尺之计，渐至侵入前线。即察木多、巴塘、里塘一带，亦必受其煽惑，日久渐成边患，且此时仅以和息了事，将来大兵撤后，倘贼匪复来滋扰，后藏距川省辽远，鞭长莫及，断无屡劳兵力，远涉剿办之理。是以特命福康安、海兰察等统兵前往，声罪致讨，无非为绥靖边陲，保护卫藏起见。”（13）

这说明清朝对廓尔喀作战，是保卫领土完整，保卫边疆安全的正义战争。它得到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进展非常顺利，迅速把侵略者驱逐出境。

打退廓尔喀的侵略之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西藏的行政管理，“设立鄂博、厘定疆域”，设立藏兵、加强防务，整理财政及贸易，制定金奔巴瓶制度等等，最重要的是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规定：西藏地方，凡用人、行政、财政、军事、对外关系等事务，统由驻藏大臣办理，这些措施把千百年来西藏和祖国其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有利于促进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对于遏制西方殖民主义者特别是英国侵略者对西藏的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早在十七世纪初，西方殖民民主者在

对我国沿海进行骚扰的同时，也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西藏。葡萄牙等国的传教士，多次乘西藏混乱之机，潜入西藏，搜集侵略情报。到十八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克服在印度的经济危机，想直接进入我国西藏地方通商，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两次派人进入后藏，企图与班禅所辖地区订立商约，都遭到了拒绝，他们利用狡诈的手段，挑拨藏族首领与清朝官员的矛盾，离间前、后藏的关系，想达到分裂西藏的罪恶目的。在廓尔喀侵藏战争中，他们暗地支持廓尔喀，想坐收渔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驱逐了廓尔喀侵略军，加强了西藏边防，英国的阴谋破产了。

历史唯物主义者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们评价乾隆这些活动时，当然也应该如此。当时国内各族人民强烈要求统一，国际上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重来，一是沙俄的入侵，早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每个毛孔都渗着鲜血和污物的资产阶级，除了对本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外，还把血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富饶的中国也成了他们侵略的一个大目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骚扰东南沿海，沙俄从北方实行武装侵略，策动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分子叛乱等卑劣手段，对我国边疆地区造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统一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乾隆统一新疆、打通廓尔喀对西藏进攻的，这是继康熙之后，最后完成了清朝统一祖国的事业，它奠定了我国今天的版图，乾隆进行这些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因而也是应该肯定的。

二、促进清代封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方面的历史作用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以外，还有几十个少数民族。除东部沿海外，其他广大边疆地区，都由少数民族居住和占据主导地位。加强多民族的统一对于国家的巩固和全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乾隆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象当时那样牢固地统一在一个中央政权之下，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民族分裂活动，对于后来的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这当然主要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清代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乾隆时期，抵御了外来的侵略，平定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社会经济得到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这些也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另外，乾隆推行了一些有利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是联合各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利用他们加强对各民族的统治。

乾隆通过明陵寝、对明末抗清死难的明朝官僚加以“廕谥”开科考、选拔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和一些知识分子作官等手段，消除汉族官僚地主的反清情绪，利用他们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

维护各少数民族中贵族的利益和特权，对他们封以官职，赐给爵位，吸收他们成为清政府的官员，给予优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763

年（乾隆二十八年）维吾尔族伯克霍集斯等到京师后，乾隆封给他们很高的官职，为他们修造了豪华的住宅和礼拜寺。1780年（乾隆五十五年）西藏的政教领袖之一班禅六世到热河为乾隆祝寿，乾隆委派了高级官员沿途照料，派儿子远处迎接，并在热河仿扎什伦布寺修造了一座豪华的喇嘛庙，供其讲经和居住，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财宝、绸缎。用乾隆的话说，这是“破一人而千万说”（14），通过优礼班禅，取得藏、蒙上层分子的欢心。

康熙时曾在热河开设了围场，经常带领蒙古王公去打猎。乾隆更把它定为一种制度，称为“木兰秋狝”。每年率领大批军队，指令蒙古王公和各少数民族陪同打猎。“从猎蒙古王公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又喀尔喀四部及四卫拉特并青海等部落扎萨克不下百余旗”（15）。这实际上是一次大型的各少数民族王公集会。乾隆就是想通过武力震慑、宴赏笼络等手段，加强同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16）。

乾隆还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17）“以俗习为治”的办法，即利用各民族固有宗教和风俗习惯进行统治，使各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倾心于清中央政府“俾清所欲，无二心焉”（19）。

盛行蒙藏地区的喇嘛教，在清初势力很大，上层喇嘛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很大影响。蒙藏民族“惟喇嘛之言是听”（20）。乾隆大力推崇和保护喇嘛教，借以加强对蒙、藏民族的控制。他说，“盖以蒙古奉佛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21），“兴黄教（即喇嘛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22）。他下令在热河修建了许多著名的豪华喇嘛庙，并把他诞生处的雍和宫也改成了喇嘛庙，供蒙藏上层分子朝谒清帝时“仰瞻”。乾隆葬身的“地宫”，也刻满了喇嘛教的经典和图案。

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都维持和利用固有风俗习惯进行治理。例如，对于西南苗族，继承了康熙、雍正以来“其苗讼仍从苗俗处分，不拘律例”（23）的作法。

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乾隆采取了“众建分其力”和官吏任免集权于中央的作法。不同的民族地区，采取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蒙古分为扎萨克制和内属蒙古，维吾尔地区采取伯克制，藏族地区采取政教合一的办法。这样互不统属，形不成统一的力盘。对于由原来各民族王公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尽量划小其势力范围。如喀尔喀布原有³³旗，到乾隆时增到82旗。少数民族中的王公贵族也必须经过清中央府府的封授，成为清朝的官吏，才能成为实际统治者，防止他们擅权和搞分裂活动。

乾隆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本人就会多种民族文字“癸亥学谈蒙古语，回番蒙古语通多”，并且自注说：“癸亥乾隆八年习蒙古语，二十五年平回部（维吾尔族），习回语（维吾尔语）；四十一年平金川，习番语；四十五年因班禅来谒，并习唐古语（藏语）”。这样，他对于汉、满、蒙、维、藏几种主要民族文字都学会了。这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中绝无仅有的，很是难能可贵。他还下令动用这五种民族文字题写了热河行宫正门“丽正门”的门额和热河行宫、沈阳故宫和沈阳清陵的下马牌。“以昭我国京一统同文之盛”（25）根据他的旨意，在原来“清文鉴”的基础上，编成汉、满、蒙、藏、维《五体清文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多种民族文字对照的大辞典。乾隆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下令成立“清字经馆”，把佛教经典“大藏经”翻译成满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金注蒙古犹常在，宝秩皇朝可独无？”并且自注说：“朕以当我朝全盛之时，不可无国书之佛经，因命开馆译定。”（26）

并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在热河建造殊象寺，命庙中的喇嘛学习满文，参加“大藏经”的满文翻译。共用18年时间，全部翻译完毕，译写三部，藏于殊象寺，成为举世闻名的珍品。可惜在近代战乱中全被损坏了。乾隆的主观目的是想借此宣扬“盛世升平”。但是，在客观上来说，“大藏经”的满文译本，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乾隆的上述一些作法，加强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上层分子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促进了国家的统一。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长期游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原来我国厄鲁特部落之一的土尔其特部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歧视与压迫，长途跋涉万余里，历时八个月，忍受了巨大牺牲，于第二年夏天全部回到了祖国。他们的首领渥巴锡与舍密台吉计议返回祖国的决心，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舍族台吉密谋，率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以惠肩焉”（2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乾隆实行的民族政策，确实有他成功的地方。从乾隆平定准噶尔之后，广大的蒙族地区一直很安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大的民族分裂事件。蒙族王公和清政府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成为清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力量。清朝的宗室昭穆对此作过一个说明：

本朝威德布扬，^皇蒙^之士，抗敌效顺，无异世臣。纯庙（乾隆）恢廓大度，尤善抚绥。其名王、郡长皆令在御前行走，结以亲谊，抚诸心腹。西域之役，如喀尔喀贝子札尔丰阿、科尔沁额駙索诺木巴珠尔；喀尔喀亲王定北将军成衮扎布，其弟郡王噶集斯察尔，阿拉善郡王罗卜藏多尔济，无不率领王师，披坚执锐。其子孙亦屡登显仕，统领禁军。上〔乾隆〕宴蒙古王公诗注：其令入宴者，率皆儿孙行辈云云。龙驭上宾，杜尔伯特汗某，几欲以身殉（28）

这当然有些阿谀的味道。但是，也可以看出蒙古王公和清中央政府的紧密关系。

乾隆所推行的民族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民族压迫政策，是联合多民族上层分子对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统治的政策，目的是维持清中央政权对全国的统治，因而有其落后、反动的一面。但是，它客观上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利于促进多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间的融合。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西方殖民主义和沙俄对我国的侵略，都是从少数民族地区入手的，乾隆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密切了同少数民族中上层分子的联系，维系了国家的统一，从而对于稳定边疆、防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的安全与领土完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对于乾隆在这方面的作用，应该给予应有的历史的肯定。

三、后期的腐朽统治，加速了清朝的衰败

乾隆统治的后期，经济凋敝、财政空虚，国力衰竭，统治危机日益严重，这是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乾隆的统治政策，则加速和促进了这种危机。

乾隆为了保持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竭力保护官僚、地主的利益和特权，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加速了土地的高度兼并集中，迫使广大劳动人民流离破产。

清初发展起来的土地兼并运动，到了乾隆初年，问题已经很严重。1748年（乾隆十三年）有一个官僚给乾隆的奏疏中就指出：“近

日田之归籍户者，大抵十之五、六。旧日有田之人，今俱为“耕之户”（29）。有些官僚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曾请乾隆下令“限田”。漕运总督顾琮提出了“每户以三十顷为限”的具体办法，乾隆严斥“断不可行，断不能行”，他反驳说：“尔以三十顷为限，则未至三十顷者，原可置买，何损于官户，何益于贫户？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问，仍属有名无实，必须户口查对，人人审问，其为滋扰，不可胜言。夫果滋扰于一时，而可收功于日后，亦岂可畏难中止，今展转思维，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强奉行，究于贫民无补，是不但无益而且有累也。”（30）当然，土地兼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是不可能彻底限制得了的。但是采取一些措施不使问题向严重方面发展还是可能的。乾隆为了保护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对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运动，不仅不加以限制，反而暗中鼓励。结果是，土地兼并运动越来越严重，土地大量集中于少数达官贵族和大地主手中。皇室庄田就有四万顷，军机大臣和坤占田八千顷，有名的“怀柔郝氏，膏腴万顷”（31）。这帮一些大土地所有者，霸占了全国大部分土地，而大批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被迫破产了。

官僚地主霸占了大量土地，征收高额地租剥削农民。农民要把收成的六成甚至八成交给地主，迫使广大农民忍无可忍，多次举行抗租斗争。1746年（乾隆十一年）福建上杭罗日光等领导的抗租斗争，是比较著名的一次。对于这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乾隆是公然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他曾经几次下令“蠲免钱粮”，但是又明确指出，“佃户与业主，其减与不减，应听业主酌量，即劝令亦难绳以定程也，岂有位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32）。结果是“仅及有田有粮之人，而贫者未能沾溉³”。乾隆蠲免的仅是地主的“钱粮”，而贫苦农民则依然遭受重租剥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了。

满洲贵族入关后，日益变得腐败，到乾隆时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乾隆本人虽然一再下令防止满洲贵族沾染汉族地主阶级的习气，但他本人则完全沾满并发展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奢侈作风。他一生喜巡游，南巡六、巡五台山、曲阜谒五、东巡谒陵四、木兰秋狝五十三次。这些活动，除木兰秋，对于国家的发展有一点促进作用外，其余的大都是游山玩水，到处修建行宫摆排场，耗费了大量财富，同时，多次用兵，花费了一亿数千万两，都造成了国库空虚。

乾隆奢侈腐化更加促进了官场的腐败，整个官僚机扬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奢侈靡费，造成了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和大量浪费，经济衰败，国力枯竭。

乾隆曾经自我吹嘘，“圣以躬行节俭为为下先”（33），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节俭论》，说皇官每年的花费，明代是七十五万两，康熙时是七十万两。到了乾隆晚年仅用二万两。昭连也说：“高宗自奉节俭，不许街市用金银饰，禁浙江锦绣代以刺丝。御膳房日用，上屡加复减。到末岁仅用二万余金，近侍告匮，不计也”（34）。一些旧的史学家，也多认为乾隆是很节俭的。其实，乾隆的奢侈靡费是非常惊人的。仅以每年他和皇太后过生日为例，都要搜到大量的金银财富。皇太后七十岁生日，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将军等交到的经费银就达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两。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过七十岁生日，王公大臣等官员仅造佛象一项，用银就有三十二万一千多两（35）而金银、玉器、古玩等不计其数。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他过八十岁生日时，“各省督抚献结采银屡钜万两，……两淮商贾献银二百万两”（36），其搜刮数额之巨，已经很惊人了。

王公大臣、督抚将军们的钱财从哪里来呢？自然是贪赃枉法、搜刮百姓来的。尽人皆知的甘肃捏报冒灾一案，几乎涉及到全省大小官

员。据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的追查，甘肃共亏银八十八万八千余两，仓粮短亏七十四万余石，这些自然饱了官僚们的私囊。同年清查山东全省亏空竟达二百万两之多。1795年（乾隆六十年）清查福建全省亏银也有二百万两之多。其余省份的情况也都可想而知。有的还公然卖官鬻爵。郑源调任湖南布政使时，凡有新授的州县官，他都不放其到任，令其高价“买缺”，再授实职。以“缺”的好坏定价，一般在一万两银子左右。郑源生活极为奢侈“家属四百人，外养两戏班，两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歇”（37）

官僚的贪污腐朽，导致了军队的腐败。乾隆五十年前后任台湾总兵的柴大纪，公开让士兵作买卖，贩卖私盐，开设赌场和烟馆，他本人则坐收重利。军队的腐败从此可见一般。

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的贪污更为严重。著名的例子就是乾隆的宠臣和珅。他通过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等手段，获得了惊人的财富。被抄家时，有人估计他的财产达八亿两，几乎相当于全国十几年的总税收。

乾隆死后，伊 壮图曾上疏嘉庆，指出：乾隆三十年以降，“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谄谀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奢侈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绳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作符身之符，此督抚所以竭力趋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38）。

土地兼并和官僚贪污腐化，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变成了衣食无着的游民。江南各省有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四川。湖南的乞丐成群结队，连“天子脚下”的京师一带，也有大量的无业游民，他们扶老携幼，四处迁徙逃亡。买卖人口的现象也相当严重。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河南夏邑、两邳、永城、虞城四县遭水灾有人买了两个童男，